



One Hundred
Classic Works of the
World Literature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

高 老 头
欧 也 妮 · 葛 朗 台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资产者的面目

某些外省城市里面，不少屋子看上去好像是最阴沉的修道院，最没有生气的旷野，最凄凉的断井颓垣，令人沉闷不欢。修道院的宁静，旷野的单调乏味和废墟的衰败气象，也许这类屋子都有一点。里面的生活起居是那么安静，如果不是街上一有陌生的脚声，窗口会突然探出一个表情像僧侣般的人，纹丝不动，黯淡而冰冷的目光把生客瞪上一眼的话，外乡行人可能把那些屋子当做无人居住的空屋。

索漠城里有一所院子，外表就有这些死气沉沉的成分。一条坑坑洼洼的街，直达城市高处的古堡，那所屋子便在街的尽头。现在已经不大有人来往的那条街，夏天热，冬天冷，有些地方灰暗得很，可是倒有些特点：小石子垫的路面，传出清脆的回声，永远清洁，干燥；街面窄而弯弯曲曲；两旁的屋子十分幽静，坐落在城根下，属于老城的部分。

有了三百年的屋子，虽是木造的，却很坚固，各种不同的格式别有风光，使索漠城的这一个地区特别引起考古家与艺术家的注意。人们走过这些屋子，不能不欣赏那些粗大的梁木，两头雕出古怪的形象，盖在大部分的底层上面，成为

一条黝黑的浮雕。

有些地方，屋子的横木压着石板，在不够结实的墙上勾勒蓝色的图案，木料支架的屋顶，年久失修，往下弯了；日晒雨淋，椽木已经腐烂，翘弯。有些地方，露出破旧黝黑的窗槛，细巧的雕刻已经看不太清，清苦的女工放上一盆石竹或蔷薇，窗槛似乎就承受不住了。再往前走，有的门上钉着粗大的钉子，我们的祖先别出心裁，刻上一些奇形怪状的文字，意义是无法知道了：或者是一个新教徒在此申明自己的信仰，或者是一个旧教徒为抵制新教而诅咒亨利四世。也有一般布尔乔亚刻印徽号，表示他们是旧乡绅，掌管过当地的行政。这一切中间就有整个法兰西历史的影子。一边是墙壁粉刷得很粗糙的摇摇欲坠的屋子，还有工匠卖弄手艺的遗物；近邻便是一座乡绅的住宅，半圆形门框上的贵族徽号，遭受过1789年以来历次革命的摧残，还看得出遗迹。

这条街上，做买卖既不是小铺子，也不是大商店，钟爱中世纪文物的人，在此可以看到一派朴素简陋的气象，完全像我们古代的习艺工场。宽大低矮的店堂，不设铺面，也没有摆在廊下的货摊，没有橱窗，但是很深，黑洞洞的，里里外外没有一点儿装饰。大门被分做上下两截，简陋地钉了些铁皮；上半截往里打开，下半截装有带弹簧的门铃，总是有人开进开出。门旁半人高的墙上，一排厚实的护窗板，白天卸掉，夜晚装上，外加铁闩好落锁。这间地窖式的潮湿的屋子，就靠大门的上半截，或者窗洞与屋顶之间的空间，透进些空气与阳光。半人高的墙壁下，是陈列商品的铺位。招徕顾客的玩意，这儿是绝对没有的。货色的种类要看铺子的性质：或摆着两三桶盐和鲷鱼，或者是几捆帆布与绳索，楼板的小梁上挂着黄铜索，靠墙放一排桶箍，再不然架上放些布匹。

你进来吧，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，干干净净的，戴着白围巾，手臂通红，马上放下手中的编织物，叫唤她的父亲或母亲来招呼你，也许是两个铜子也许是两万法郎的买卖，对你或冷淡，或殷勤，或傲慢，那得看店主的性格了。

你也可看到一个做酒桶木材生意的商人，两只大拇指绕来绕去，坐在门口跟邻居聊天。表面上他只有些酒瓶架或两三捆薄板，但是安茹地区所有的箍桶匠，都是向他码头上备货充足的工场购料的。他知道如果葡萄的收成好，他能多卖掉多少桶板，估计的准确性在一两块板上下。一天的好太阳叫他发财，一场雨水叫他亏本：酒桶的市价，一个上午可以从十一法郎跌到六法郎。

这个地方也像都兰区域，市面是由天气控制的。种葡萄的，有田业的，木材商，箍桶匠，旅店主人，船夫，都眼巴巴地盼望太阳；晚上睡觉也不踏实，就怕清早起来听说昨夜结了冰；他们怕风，怕雨，怕旱，一忽儿要雨水，一忽儿要天晴转暖，一忽儿又要乌云笼罩。在天公与尘世的利益之间，争执是没个完的。晴雨表能够叫人愁，叫人笑，叫人高兴。

这条街从前属于索漠城，从这一头到那一头，“黄金一般的好天气”这句话，对每户人家都代表一个收入的数目。而且个个人会对邻居说：“是啊，天上落下金子了。”因为他们知道一道阳光和一场时雨会带来多少利益。在天气美好的季节，到了星期六中午，就无法买到一个铜子的东西。做生意的人也有一个葡萄园，一块小园地，全要下乡去忙乎两天。买进，卖出，赚头，一切都是预先计算好的，生意人尽可以花大半日的功夫打哈哈，说长道短，刺探他人的私事。某家的主妇买了一只竹鸡，邻居就要问她的丈夫是否煮得恰到好处。一个年轻的姑娘偶尔从窗口探出头来，决没有办法

不让所有的闲人瞧见。因此大家的良心是坦露的，那些无从窥探的，又暗又静的屋子，并掩盖不了什么秘密。

一般人几乎总在露天生活：每对夫妇坐在大门口，在那里吃中午饭，晚饭，吵架拌嘴。街上的过路人，没有一个不是经过他们研究的。所以那时一个外乡人到外省，免不了到处被人家取笑。许多有趣的故事便是这样得来的，昂热人的爱寻开心也就这样出了名，因为编这一类的市井笑料是他们的拿手好戏。

早先本地的乡绅全住在这条街上，街的高处都是古城里的老宅子。世道人心都还朴实的时代——这种古风现在是一天天的衰灭了，——的遗物。我们这个故事中的那所凄凉的屋子，就是其中之一。

古色古香的街上，连偶而遇到的小事都能唤起你的回忆，全部的气息使你不由得沉入遐想。拐弯抹角的走过去，你可以看到一处黑幽幽凹进去的地方，葛朗台府上的大门便藏在这凹坑中间。

在外省把某个人的家称做府上是有分量的；不知道葛朗台先生的身世，就无法掂出这称呼的分量。

葛朗台先生在索漠城的名望，自有它的前因后果，从没在外省逗留过的人是不能完全了解的。葛朗台先生，有些人还称其为葛朗台老头，可是这样称呼他的老人越来越少了，他在1789年上是一个很富裕的箍桶匠，识得字，能写会算。共和政府在索漠地区标卖教会产业的时候，他刚好四十岁，才娶了一个有钱的木板商的女儿。他拿自己的钱款和女人的陪嫁，凑成两千金路易，跑到县政府。标卖监督官是一个强凶霸道的共和党人，葛朗台把丈人给的四百路易往他那里一送，就很便宜的，即使不能算正当，至少是合法的买到了县里最好的葡萄园，和一座老修道院、几块分种田。

索漠的市民绝少革命气息，在他们眼中，葛朗台老头是一个激烈的家伙，前进分子，共和党人，关切新潮流的人物；其实这位箍桶匠只关心葡萄园收成。上面派他当索漠县的行政委员，于是地方上的政治与商业都受到他潜在的影响。

在政治方面，他庇护从前的贵族，想尽办法使流亡乡绅的产业不被公家标卖；商业方面，他向革命军队承包了一二千桶白葡萄酒，但为此也获取了某个女修道院上好的草原，把本来留作最后一批标卖的产业，弄到了手。

拿破仑执政的年代，好家伙葛朗台当上了市长，把地方上的公事应付得很好，可是他葡萄的收获更好；但拿破仑称帝的时候，他变成了光杆儿的葛朗台先生。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，另派了一个乡绅兼大地主，一个后来晋封为男爵的人来代替葛朗台，原因是他有红帽子嫌疑。葛朗台被罢掉市长的荣衔，并不惋惜。在他任期内，名誉上为了本城的利益，已经修好几条出色的公路直达他的产业。他的房产与地产登记的时候，占了不少便宜，只交很少的税。自从各处的庄园登记之后，靠他不断的经营，他的葡萄园一跃成为地方上的顶儿尖儿，这个专门的形容词是说这园里的葡萄能够酿成极品的好酒。总而言之，他简直有资格获得荣誉团的勋章。

免职的事发生在 1806 年。那时葛朗台五十七岁，他的女人三十六岁，他们的独养女儿才十岁。

也许是老天见他丢了官，想安慰安慰他吧，这一年上葛朗台连接得了三笔遗产，先是他丈母娘德·拉戈迪尼埃太太的，接着是太太的外公德·拉贝特利耶先生的，最后是葛朗台自己的外婆，冉蒂耶太太的；这些遗产数目之大，没有一个人能知道。三个老人爱钱如命，一生都在积聚金钱，以便

私下里暗自摩挲把玩。德·拉贝特利耶老先生把放债看做挥霍，觉得能时刻对黄金看上几眼比放高利贷还实惠。所以他们积蓄的数目，索漠人只能以看得见的收入估计。

于是葛朗台先生得了新的贵族头衔，那是尽管我们总讲平等也消灭不了的，他升为本地区“纳税最多”的人物。他的葡萄园有一百阿尔邦，收成好的年份可以出产七八百桶酒，他还有十三处分种田，一座老修道院，修道院的窗子，门洞，彩色玻璃，全都被他从外面堵死了，这样既可付捐税，又可保存那些东西。此外还有一百二十七阿尔邦的牧场，里面的三千株白杨是1793年种下的。他居住的屋子也是自己的产业。

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家私。至于他现金的数目，只有两个人知道大概。一个是公证人克罗旭，是替葛朗台放债的，另外一个则是德·格拉桑，索漠城中最有钱的银行家，葛朗台认为合适的时候同他暗中合作一把，捞些好处。在外省要得人信任，要挣家业，行事非样样机密不可；老克罗旭与德·格拉桑虽然机敏透顶，仍免不了当众对葛朗台毕恭毕敬，使旁观的人看出前任市长的资力何等雄厚。

索漠城里每个人都相信葛朗台家里藏有一个私库，一个堆满金路易的秘窟，说他半夜里瞧着累累的黄金，快活得无可形容。一般吝啬鬼认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，因为看见那好家伙连眼睛都会黄澄澄的，染上了金子光彩。一个靠资金赚惯大利钱的人，像色鬼，赌徒，或帮闲的清客一样，眉眼自有那种道不出的神气，一派的躲躲闪闪，害馋痂似的，神秘兮兮，决计瞒不过他的同道。凡是对什么东西着了迷的人，这些暗号无异帮口里的切口。

葛朗台先生从未欠过人家什么；既是老箍桶匠，又是种葡萄的老手，什么时候准备收成一千只桶，什么时候只需五

百只桶，他预算得像天文学家一样准确；投机事业从未失败过，酒桶的市价比酒还贵的时候，他老是能有酒桶出卖，并把酒藏起来，等每桶涨到两百法郎才抛出去，一般小地主却早已按纳不住在一百法郎的时候脱手了。这样一个人物当然博得大家的敬重。那有名的 1811 年的收成，他牢牢地围在家里，一点一滴的慢慢卖出去，净挣了二十四万多法郎。论起理财的本领，葛朗台先生是只老虎，是条巨蟒：他会躺在那里，蹲在那里，把俘虏打量个半天再扑上去，张开血盆大口似的钱袋，倒进去大堆的金银，然后安安稳稳的去睡觉，好似一条蛇吃饱了东西，不动声色，冷静非凡，凡事都按部就班的。

他走过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不觉得既钦佩，又敬重，又害怕。索漠城中，不是每个人都被他钢铁般的利爪干净利落的抓过一下的吗？某人为了买田，从克罗旭那里贷到一笔借款，利率要一分一，某人拿期票向德·格拉桑换现，给先扣了一大笔利息。市场上，或是夜晚的闲谈中间，不提到葛朗台先生大名的时候很少。有些人甚至认为，这个种葡萄老头的财富简直是地方上的一宝，值得夸耀。不少做买卖的，开旅店的，得意扬扬的对外客说：

“嘿，先生，上百万家产的咱们有两三家；可是葛朗台先生哪，连他本人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家私！”

1816 年的时候，索漠城里顶会计算的人，估算那好家伙的地产大概到达四百万；但在 1793 年到 1817 年中间，平均每年的收入该有十万法郎，由此推算，他所有的现金大约和不动产的价值差不多。因此，打完了一圈牌，或是谈了一会葡萄的情形，又提到葛朗台的时候，一般自作聪明的人就说：“葛朗台老头吗？总该有五六百万吧。”要是被克罗旭或德·格拉桑听到了，就会说：

“你好厉害，我倒从来不清楚他的总数呢！”

遇到什么巴黎客人提到罗希尔德或拉斐特那样大银行家，索漠人就要问，他们是不是也同葛朗台先生一样有钱。如果巴黎人付之一笑，回答说是的，他们便把脑袋一侧相互瞪着眼，满脸不相信的神气。

偌大一笔家产把这个富翁的行为都镀了金。倘使他的生活起居中也许有什么可笑的地方，给人家当了话柄，那些话柄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葛朗台的一举一动都像是法定的，到处行得通；他的谈吐，衣着，姿势，瞪眼睛，都是地方上的金科玉律；大家把他仔细研究个透，像自然科学家要从动物的本能中研究出它的作用一样的，终于发现他最琐屑的动作，也藏着深邃而不可言传的智慧。譬如，人家说：

“今年冬天一定很冷，葛朗台老头已把皮手套戴上了：咱们该收割葡萄了吧。”

或者说：

“葛朗台老头买了许多桶板，今年的酒一定不会少。”

葛朗台先生从来不用买肉，不用买面包。每个星期，那些佃户自然会给他送来一份充足的食物：阉鸡，母鸡，鸡子，牛油，麦子，都是用以抵租的。他把一所磨坊租给人家，磨坊司务除了缴付租金以外，还得亲自来拿麦子替他去磨，再把面粉跟麸皮送回来。他的唯一的老妈子，叫做长脚拿依的，虽然上了年纪，还得每星期六替他做面包。房客之中有种菜的，葛朗台便派定他们供应菜蔬。至于水果，收获之多，大部分用来出售。炉用烧火的木材，是把田地四周的篱垣，或烂掉一半的老树，砍下来，由佃户锯成一段一段的，用小车拉进城，他们还用心巴结，替他送进柴房，讨得几声谢。他的开支，据人家知道的，只有教堂里坐椅的租费、圣餐费、太太和女儿的衣着、家里的灯烛、拿依的工

钱、锅子的镀锡、国家的赋税、庄园的修理和种植的费用。他最近买了六百阿尔邦的一片树林，托一个近邻照顾，答应给一些津贴。自从他置了这个产业之后，他才吃野味。

这家伙动作异常简单，说话不多，发表意见常是用柔和的声音，简短的句子，搬弄一些老生常谈。从他出头露面的大革命时期起，逢要到长篇大论说一番，或者跟人家争论什么，他便马上结结巴巴的，弄得对方头晕脑胀。这种口齿不清，理路不明，前言不搭后语，以及废话连篇把他的思想调理不清的情形，人家当他是缺少教育，其实完全是伪装的；等会儿故事中有些情节，就足以解释明白。而且逢到要应付，要解决什么生活上或买卖上的难题时，他就要搬出四句口诀，像代数公式一样准确，叫做：“我不知道，我不能够，我不愿意，慢慢瞧吧。”

他从来不明确说一声是或不是，也从不把黑字落在白纸上。人家跟他说话，他冷冷的听着，右手托着下巴颏儿，肘子压在左手背上；无论什么事，他一旦拿定了主意，就永世不变。一点点儿小生意，他也能盘算半天。经过一番钩心斗角的谈话之后，对方自以为心中保守得密不透风的秘密，其实早已吐露出来。他却回答道：

“我还没有跟太太商量过，什么都不能决定。”

被他压得像奴隶般的太太，却是他生意上最得力的挡箭牌。他从来不拜访别人，不到人家吃饭，也不请人家；他没有一点儿动静，似乎什么都要节约，连动作在内。因为尊重旁人的主权，他绝对不动人家的东西。

可是，尽管他声音柔和，态度持重，仍不免要露出箍桶匠的谈吐与习惯，尤其在家里，不似在旁的地方那么顾忌。

至于体格，他身高五尺，臃肿，横宽，腿肚子的圆周有一尺，多节的膝盖骨，宽大的肩膀；脸是圆的，黑油油的，

有痘瘢；下巴笔直，嘴唇没有一点儿弧线，牙齿雪白；冷酷的眼睛好象要吃人，是一般所谓的蛇眼；脑门上布满皱折，一块块隆起的肉颇有些奥妙；青年人不知轻重，私下里开葛朗台先生玩笑，把他黄黄而灰白的头发叫做金子里搀白银。鼻尖肥大，顶着一个布满血筋的肉瘤，一般人不无道理的说，这瘤里全是刁钻促狭的玩意儿。这副脸相显出他那种阴险的狡猾，显出他有目的的诚实，显出他的自私自利，所有的感情都集中在吝啬的乐趣上，和他唯一真正关心的独养女儿欧也妮身上。而且姿势，举动，走路的架势，他身上的一切都表示他只信任自己，这是生意上左右逢源养成的习惯。所以虽然他表面上性情平易，很好对付，骨子里却坚似铁石。

他老是固定的装束，从 1791 年以来始终是那副模样。笨重的鞋子，鞋带也是皮做的；四季都穿一双呢袜，一条栗色的粗呢短裤，用银箍在膝盖下面扣紧，上身穿一件方襟的闪光丝绒背心，颜色一条儿黄一条儿古铜色，外面罩一件衣裙宽大的栗色外套，扎一条黑领带，戴一顶阔边帽子。所用的手套跟警察的一样结实，要用到一年零八个月，为保持清洁起见，他有一个百年如一的手势，把手套放在帽子边缘上一定的位置。

关于这个人物，索漠人所知道的不过这一些。

城里的居民有资格在他家出入的只有六个。前三个中最重要的是克罗旭先生的侄子。这个年轻人，自从当了索漠初级裁判所所长之后，在原姓克罗旭之上又加了一个篷风的姓氏，并且极力想叫篷风出名。他的签名已经变成克·德·篷风了。倘使有那位冒失的律师仍旧称他“克罗旭先生”，包管在出庭的时候要后悔他的健忘。凡是称“所长先生”的，就可获得法官的庇护。对于称他“德·篷风先生”的马屁精，

他更不惜春风满面的报以微笑。所长先生三十三岁，有一处名叫篷风的田庄，每年有七千法朗进款；他还可以得到两个叔父的遗产，一位是克罗旭公证人，一位是克罗旭神甫，他属于都尔城圣马丁大教堂教士会；据说这两人都相当有钱。三位克罗旭，房族既多，城里的亲戚也多达一二十家，自发结成一个党，就像从前佛罗伦萨的那些梅迪契家族一样；而且正如梅迪契有帕济一族跟他们对垒似的，克罗旭也有他们的敌党。

德·格拉桑太太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儿子，她非常热心地陪葛朗台太太打牌，希望她亲爱的儿子阿道尔夫能够和欧也妮小姐结婚。银行家德·格拉桑先生更是拿出全副解数从旁协助，对吝啬的老头儿不断暗中帮忙，逢到攸关大局的紧要关头，从来不落人后。这三位德·格拉桑也有他们的帮手，房族，和忠实的盟友。

在克罗旭方面，神甫是智囊，加上那个当公证人的兄弟做后援，他全力以赴跟银行家太太竞争，以求葛朗台的大笔遗产能留给自己的侄儿。克罗旭和德·格拉桑两家暗中争夺欧也妮的斗法，成为索漠城中大家小户热心关切的话题。葛朗台小姐将来嫁给谁呢？所长先生呢还是阿道尔夫·德·格拉桑？

对于这个棘手的问题，有些人的答案是两个都不会得到手。据他们说，老箍桶匠心高的很，要找一个贵族院议员做女婿，凭他年收三十万法郎的陪嫁，谁还计较葛朗台过去、现在，将来的那些酒桶？另有一批人却回答说，德·格拉桑是世家，很有钱，阿道尔夫又有一个英俊后生，这样一门亲事一定会叫出身低微，拿过斧头凿子，而且还当过革命党的人心满意足，除非他还有什么教皇的侄子之流。可是老于世故的人会提醒说，克罗旭·德·篷风先生随时进出葛朗台家，

而他的敌手只能在星期日受招待。有的认为，德·格拉桑太太跟葛朗台家的女眷们，比克罗旭一家亲近得多，天长日久，一定能说服她们，达到她的目的。有的却说克罗旭神甫的花言巧语天下第一，女人跟出家人对抗，正好势均力敌。所以索漠城中一个才子说：

“他们正是棋逢对手，各显神通。”

据地方上熟知内情的老辈看法，像葛朗台那么精明的人，决不愿家私落在外人手里。索漠的葛朗台还有一个兄弟在巴黎，一个富有的酒商；欧也妮小姐将来是嫁定巴黎葛朗台的儿子的。对这种意见，克罗旭和德·格拉桑两家的羽党都持异议，说：

“一则两兄弟三十年来没有见过两次面；二来巴黎的葛朗台先生对儿子的期望很大。他本人是巴黎某区的区长，兼国会议员，禁卫军旅长，商务裁判所推事，据说跟拿破仑提拔的某公爵有姻亲，早已不承认索漠的葛朗台是 본家。”

周围七十八里，甚至在昂热到布卢瓦的驿车里，都在热烈谈论这个有钱的独养女儿的婚姻大事，七嘴八舌，众说纷纭当然是应有之事。

1818年初，有一桩事情使克罗旭党明显地占了德·格拉桑党上风。弗鲁瓦丰田产素来以美丽的别庄，园亭，小溪，池塘，森林出名，总价值三百万法郎。年轻的弗鲁瓦丰侯爵急需现款，只得把这所产业出卖。克罗旭公证人，克罗旭所长，克罗旭神甫，再加上他们的忠实羽党，居然把侯爵分片出售的意思打消了。公证人告诉他，分做小块标卖，势必要与投标人打多次官司，才能拿到田价；最合算的方法是整块儿让给葛朗台先生，既买得起，又能付出钱。公证人这番话把卖主说通了，做成一桩特别合算的好买卖。侯爵的那块良田美产，就这样给张罗着送到了葛朗台嘴里。他出乎索漠人

的意料，竟打了些折扣当场把田价付清。这件新闻一直传播到南特与奥尔良。

葛朗台先生搭着别人回乡的小车，到别庄上来视察了。并以主人的身分对产业评估一番，回到城里，觉得这一次的投资足有五厘利，他马上又得了一个好主意，准备把全部田产并在弗鲁瓦丰。随后，他要把差不多空了的金库重新填满，把他的树木，森林，一齐砍下，再把草原上的白杨也出卖。

“葛朗台先生府上”的这个称呼，现在你们该明白它的分量了吧。那是一所灰暗，阴森，静寂的屋子，坐落在城区上部，靠着坍塌的城脚。

门框的穹窿与两根主柱，也同正屋一样用的灰凝土，是卢瓦尔河岸特产的一种白石，质地松软，是用不到两百年以上的。寒暑的酷烈，已把柱头，门洞，门顶，磨出无数古怪的洞眼，象法国建筑的那种虫蛀样儿，也有几分像监狱的大门。门顶上面，有一长条硬石刻成的浮雕，象征四季的形象已被剥蚀，变黑。浮雕的础石突出在外面，横七竖八的长着些野草，黄色的苦菊，五爪龙，旋覆花，车前草，一株小小的樱桃树已经长得很高了。

褐色的大门是用整块的橡木板做的，十分干燥，到处开裂，看上去觉得很单薄，其实很坚固，因为有一排对花的钉子支持。一边的门上有扇小门，中间开了一个小方洞，装了铁栅，排得很密的铁梗锈得发红，铁栅上挂一个环，上面吊一个敲门用的铁锤，正好敲在一颗怪模怪样的大钉子上。铁锤是长方形的，像古时的钟锤，又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；一个玩古董的人仔细打量一番，可以发见锤子当初是一个小丑的形像，但是年深月久，已经磨平了。

那个小铁栅，当初在宗教战争的年代，是预备给屋内的

人窥视来客的。现在喜欢向外张望的人，可以从铁栅望到黑幽幽的半绿不绿的环洞，环洞底上有几级七零八落的磴级，通往花园。厚实而潮湿的围墙，到处渗着水迹，生满垂头丧气的杂树，倒也别有一番景致。这面墙原来是城墙的一部分，邻近人家都利用它布置花园。

楼下最主要的房间是那间“堂屋”，从大门内的环洞进出。在安茹、都兰、贝里各地的小城中间，一间堂屋的重要性，外方人是不会懂得的。它同时又是穿堂，客厅，书房，上房，饭厅；它是日常生活的轴心，全家合用的起居室。本区的理发匠，为葛朗台先生一年理两次发是在这里，佃户、教士、县长、磨坊伙计上门的时候，也同样在这间屋里。室内有两扇临街的窗户，铺着地板；古式嵌线的灰色护壁板从上铺到下，顶上的梁木全暴露在外面，也漆成灰色；梁木中间的楼板涂着白粉，却已发黄了。

壁炉架上面挂着一面映出青光的镜子，两旁的边划成斜面，显出玻璃的厚度，一丝丝的闪光照在哥特式的镂花钢框上。壁炉架是粗糙的白石面子，安放着一座黄铜的老钟，壳子上有螺钿嵌成的图案。左右放两盏黄铜制的两用烛台，座子是铜镶边的蓝色大理石，上面有着好几支玫瑰花瓣形的灯芯盘；把这些盘子拿掉，座子又可分成为一个单独的烛台，在平常日子里应用。

古式的坐椅，花绸面子上织着拉封丹的寓言，但若不是博学之士，根本认不出它们的内容：颜色尽褪，到处是补钉，人物已经模糊。四边壁角放着三角形的酒橱，顶上有几格放零星小件的搁板，全是乌黑油腻。两扇窗子中的板壁下面，有一张嵌木精细的旧牌桌，桌面上画着棋盘。牌桌背面的壁上悬挂一只椭圆形的晴雨表，黑框子周围有金漆的丝带形花边，苍蝇肆无忌惮的在上面爬上爬下，恐怕不会留下

多少金漆了。

壁炉架对面的壁上，挂两幅水粉画的肖像，一个是葛朗台太太的外公，德·拉贝特利耶老人，穿着王家卫队中尉的制服；一个是已故的冉蒂耶太太，挽着一个古式的髻。窗帘用的是图尔红绸，两旁用系着大坠子的丝带吊起。这种奢华的装饰与葛朗台一家很不调和，原来是这所屋子原有的，连镜框，座钟，全套软垫家具，红木酒橱等等都是。

靠门的窗洞下面，一张草垫椅子放在一个木座上，葛朗台太太便坐这观望街上的行人。另外一张褪色樱桃木的女红台，把窗洞下的空间填满了，近旁是欧也妮的小靠椅。

十五年以来，每年四月到十一月，母女俩就在这个位置上安安静静消磨日子，手里永远拿着活计。十一月初一，她们才可以搬到壁炉旁边过冬。只有到那一天，葛朗台才允许在堂屋里生火，但三月三十一日就得熄掉，不管春寒还是早秋的凉意。四月和十月里最冷的日子，长脚拿依便想法从橱房里腾出些柴炭，安排一只脚炉，给太太和小姐挡挡早晚的寒气。

全家的内衣被服都由母女俩负责，她们专心致志，象女工一样整天劳作，至于欧也妮想替母亲绣一方挑花领，也只能省出睡觉的时间来做，还得想方设法来骗取父亲的蜡烛。女儿与拿依用的蜡烛，吝啬鬼总是亲自分发的，像每天早上分发面包和食物一样。

恐怕只有长脚拿依受得了她主人的那种专制与吝啬。索漠城里都羡慕葛朗台夫妇有这样一个老妈子。大家叫她长脚拿依，只因为她身高五尺八寸。她在葛朗台家已经做工三十五年了。虽然一年的工薪只有六十法郎，但她算得上城里最有钱的女仆了。一年六十法郎，攒了三十五年，最近居然有四千法郎存在公证人克罗旭那儿做终身年金。这笔多年不断

的积蓄，似乎是一个了不起的数目。每个年轻女佣看见这个上了六十岁的老妈子居然有了老年的口粮，都十分眼热，却没有想想这份口粮是如何辛辛苦苦做牛马换来的。

二十二岁的时候，这个可怜的姑娘到处没有人要，她的丑陋相令人害怕；其实这么说也有些过分，把她的脸放在一个掷弹兵的脖子上，还可能受到人家称赞哩；可是无论什么东西都要相称。她原来替农家放牛，农家遭了火灾后，她就凭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，进城来找事。

那时葛朗台正准备自立门户，预备娶亲。他瞥见了这位到处碰壁的女孩子。以箍桶匠的眼光判断一个人的体力是相当准确的：她体格像大力士，站在那儿就像一株六十年的橡树，根牢固实，粗大的腰围，四方的背脊，一双糙手像个赶车的，诚实不欺的品德，正如她的贞操一样纯洁无瑕；在这样一个女人身上可以榨取多少利益，他当时就算得清清楚楚。雄赳赳的脸上长满了疣，紫膛膛的皮色，青筋隆起的胳膊，褴褛的衣衫，拿依这些外表并没吓退箍桶匠，虽然他那时还在能够动心的年纪。他给这个流浪的姑娘衣着、鞋袜、膳宿，出了工钱雇用她，并不过分的虐待、糟蹋。

长脚拿依受到这样的待遇快活得哭了，就一片忠心赤诚地服侍箍桶匠。而箍桶匠当她家奴一般利用。拿依承办一切：煮饭，蒸洗东西，到卢瓦尔河边去洗衣服，担在肩上回来；天一亮就起身，深夜才睡觉；收成时节，所有短工的饭食都由她料理，还不让人家捡取落在地下的葡萄；她像一条忠心的狗一样保护主人的财产。总之，她对他软佩得五体投地，无论他任何想入非非的念头，她都一声不哼的服从。1811 那有名的一年收获季节特别辛苦，拿依这时已经服务了二十年，葛朗台才发狠赏了她一只旧表，那是她到手的唯一礼物。尽管他一向把穿旧的鞋子给她（她正好穿得上），